

前几年电影《一九四二》述河南灾情后，蒋介石到张钫家借款借粮，张允出一半家产赈灾，与史实有很大出入。据李鸣考证，事在1942年9月3日，蒋巡视西北各省后，到西安召见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、河南省长李培基、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兼河南旅陕同乡会会长张钫，垂询豫灾，拨款一千万，并大幅减免税赋。虽有出入，但说到河南救灾，就必须提到张钫，他是河南赈灾的关键人物。

张钫(1886-1966)是河南新安人，清末从军，为陕西新军辛亥起义的核心人物。民初袁世凯任他为陆军中将，孙中山委他为中华革命军豫陕联军总司令、会办陕西军务，以后历北洋至南京时期，历任要职，他又兴办实业，富甲一方，在豫、陕两省久具人望。

早在1929年，蒋冯战争时，张钫就曾以河南建设厅长及代省长身份，兼任河南赈务委员会主席，在开封办粥厂六个，为灾民提供参军做工、上学读书的机会，倡议成立灾童教养院。1935年伊洛暴涨，偃师县城陆沉，他复发动河南各方募捐集资，重建偃师新城。抗战初期黄河花园口决堤，这一迟滞日军南下举动的直接后果，是造成数以百万计的豫省灾民。张钫作为豫籍人士，又曾主豫政，毫不犹豫地将为灾民救赈、安置灾民生存，为灾民谋求生活保障，作为他的主要任务承担起来。他以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身份，在西安成立豫灾救济委员会，设立两个难民收容所，先后接待难民逾千人，提供食宿，再安置到甘肃、宁夏、新疆落户。同时，

濠上漫与

张钫与河南赈灾

■ 陈尚君

他向国民政府提案，要求落实救济黄灾办法。

1942年，河南大灾，大批难民涌入西安，原先的收容所已经不能承受。张钫以自己的威望，约集旅陕河南名人、巨商及陕西各界官商，到自宅开会，商讨救赈事，在西安广设收容所，并借各学校教室供灾民住宿，变卖家产购粮赈灾，自己的丈八沟豪宅也让灾民进驻。1944年，日寇窜犯河南，河南学生和灾民数十万人涌入陕西，张钫动用一切力量加以救济。他晚年谓平生有两大快事：其一，在灾民大规模进入西安时，他“电话警察局，请以余名转告全市居民，每户漏夜蒸馍六斤，拂晓送站救济难民，均能如时送到”。其二，“又在龙驹寨一小乡镇，筹款数百万，救济难民学生，并令其临时结队西上，余则乘车前行，请沿途预备食宿，幸使数万流离青年安抵西京。”

灾民的安置与救济仅能解决眼前困境，长期则要为灾民提供生存机会。张钫提请政府落实五万灾民移垦河西，申请三千万元，筹办西北移民垦干班，并条陈七事，认为移民有关国防，要有组织，有培训，并区分为移农、移工、移商、移兵四项。这些举措，得到



1913年，时任陕军第二师师长的张钫戎装照。

部分落实，在甘肃形成众多河南村。对逃陕学生、教员，更要安排住所，发放口粮，提供学习条件。

1945年6月，张钫曾在西安皇城召集在陕河南各中学师生会议，畅谈河南对抗战的贡献，更说到自己的责任：“你们这么多教员学生到西安来，一个月三斗八升的口粮，还是我这个参议院副院长拿老牌子给要来的”，要师生报效国家，报效乡里，“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河南人”。

抗战胜利后，张钫更组织安

排灾民返回乡里，重新建设。但当时内战初起，赋税高悬，河南省议会组织灾情哭诉团，到南京、上海请求减免税赋。在南京虽奔走各院部，但备受冷落，成效甚微。到上海后，张钫参与接待，先在四马路杏花楼宴请哭诉团全体，然后约集上海各界成立河南赈灾上海市筹募委员会，又求得杜月笙支持，在虞洽卿公馆举办哭诉团招待会，邀请社会名流，连孔祥熙都到了，并当场允诺尽力拯救河南灾民。随后又拜访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代表，争取了大量物资救助。梅兰芳也出面组织书画义卖，所得全部捐赠。那时张钫声望很高，蒋既不重用他，也不愿开罪他，他因得缘为乡梓做了大量实事。

早年读岑仲勉著作，屡引《千唐》，竟不知为何书，稍晚方知是民国间元老张钫收藏一千多种唐代石刻的总汇，各大学多有整套拓本收藏，非个人能购置。不久文物出版社就出了影印本，据说因是张之后人在台湾位居要职，方有此议。

近年则知同学李鸣是张钫外孙女，2006年在京见到，将从中国银行办公室退休。邀饭时，出示张家故物与亲属合影，说退休后余暇，拟作先外祖之研究，我亟表

赞同。李鸣坚持十多年，走遍南北各图书馆、档案馆搜寻文献。她精力充沛，性情开朗，万事不以为难。比方到档案馆，如果是我，总觉得麻烦别人太多，足未进而趋，口欲言已嗫嚅，李鸣则不然，推门进查阅大厅，即高呼：“大家好，我来查档案了！”所得尤富。先期所得编为《纪念张钫先生文选集》，属我作序。陆续所得又倍之，更得她在台湾众多热心的表兄表妹帮助，今年新出《纪念张钫先生文集》赠我，真做到老有所为，我也得多知张钫往事。

张钫是近代罕见的福将。他早年因发动辛亥陕西新军起义而彪炳史册，后历经鼎革，始终不倒，长为上宾，得各方礼遇。平生出入军、政、商、学各界，各有建树。陇海线开建时，他在河南主政，开掘所得汉唐碑石，全部用军车辇归故里，建千唐志斋收存，复以全拓分售各公私图书馆，世不以为非。他有家学渊源，伯祖张宗泰有《鲁岩所集》，为阮元所称道。他早年著《历代军事分类诗选》，蔡元培序称其“振国魂而御外侮”；晚年著《风雨漫漫四十年》，回忆一生经历重大事件，近距离接触民国诸大佬之观感，极其精彩。他携全家赴台后，复被派回陕川边，在川北归诚，蒋不疑其叛，对其子弟部属仍有信任。1953年其母在台湾去世，他请假欲赴台湾奔丧，也未引起芥蒂。这一切，不仅因他辈份高，具人望，办事坦然，更因他的彻悟人生，洞达生死。他自题千唐志斋联：“谁非过客，花是主人。”正是他的人生体会。

《西行漫记》的艰辛出版经历

■ 周铁钧

1936年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陕北解放区采访、考察五个多月，写出一部纪实通讯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该书1937年在英国出版，八个星期内五次重印，售出十余万册，引起广泛国际反响。白求恩、柯棣华就是受这部著作感动、鼓舞，毅然奔赴延安支援抗日的。

当时在“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”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愈之，读完英文版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敏感地意识到，这部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，揭穿国民党对解放区造谣污蔑，介绍陕北真实面貌的书籍，应马上着手翻译出版。他的想法得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的支持。刘少文刚从延安至沪，知道书中许多重要内容经过毛泽东、周恩来的审定，准确可靠，出版重任就此落到了胡愈之肩上。

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出版管制十分严厉，出版物须经“新闻总署”审批。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这样的“赤书”不可能得到批准。胡愈之的胞弟胡仲持想出办法，成立一个文化社团，以“抗日读物”名义出版。当时“淞沪会战”刚结束，国民爱国热情高涨，许多民间文化团体创办报刊、编印书籍宣传抗战。

不久，一个名为“复社”的文化团体在上海成立。经胡愈之、胡仲持和中共党员梅益、林淡秋聘请，《上海周报》主编吴景崧、编辑部宗汉，《译报》主编冯宾符，《救亡日报》编委傅东华，《中华书局》编辑倪

文宙和进步学者章育武、陈仲安、王厂青十二人组成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翻译小组。大家得知译书的重大意义，纷纷跃跃欲试地索要样书，怎奈样书仅有一本，胡愈之只得将十二章三十多万字的书拆开，每人各分得一章。

众人各自翻译，却发生了许多难料的险象与意外。如倪文宙被人诬告私藏禁书，家中遭特务搜查，未译的书稿被翻出。幸亏书页没头没尾，倪文宙谎称翻译论文，得以蒙混过关。冯宾符把书稿放进保险箱，午夜贼人入室撬开，将书稿连同钱财一起掠走。没了原稿，冯一筹莫展，后几经波折，在一位英国侨民那里找到一本，才救了燃眉之急。

二十多天，译稿陆续交齐。胡愈之通读后不禁叫苦，原来，“各自为战”式的翻译，内容无法前后照应，许多回忆、倒叙的情节接不上甚至自相矛盾。另外，译者对书中内容不完全了解，许多名字、术语不知如何翻译，只好音译。如“林伯渠”、“杨家岭”，有的译成“藺波趋”、“林博曲”、“羊夹铃”、“洋伽灵”等。译稿谬误百出，胡愈之只得放下手头事情，把自己关在亲属家阁楼里，用了十三个日夜修改、校正错译和笔误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为把译稿校对得通顺无误，我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，十三天瘦了五斤多。”

书稿校完，确定书名时又出现了争议。有人主张维持原貌，依然用《红星照耀

中国》；有人提出，“红星”会让人联想到“共产党”、“红军”，为避免麻烦应改名。胡愈之与刘少文商议，决定取名《西行漫记》，因当时党中央在大西北，“西”也可以暗喻延安、共产党。

书稿敲定，还面临一个更严重问题：资金。经预算，印刷二千册需二千五百元。当时上海民不聊生，工商业经营惨淡，极难找到富豪资助出版。这时，上海《读书》杂志编辑杜元启欲投奔解放区，来找胡愈之帮忙联系。他得知《西行漫记》出版遇到困难，自告奋勇去找其远房叔叔——上海帮会大亨、时任“上海各界后援会”主席的杜月笙。当时杜月笙爱国热情正高，听说侄儿要出版抗日书籍，很爽快地拿出一千元。

得到千元资助，胡愈之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还有一大笔经费没有着落。杜元启又出主意，《读书》杂志麾下有个“读友会”，会员二千多名，不妨将《西行漫记》打折预售，缴钱就发一张代金券，出版后凭券领书。此法果然奏效，没几天就筹到了一千五百元。

资金齐备，胡愈之满心喜悦地联系印刷。问题又来了，因淞沪战争，印刷厂多已

迁往内地。如在沪外印刷，书在运输途中极易被查，凶多吉少。后经多方打听，终找到一家未搬走的印刷厂，但已停业，工人也全被辞退。在“上海工人救国会”的帮助下，找到十多位印刷工人，大家夜以继日苦干二十多天，二千册《西行漫记》终于印就并运到“复社”。胡愈之等人翻阅历经艰辛、坎坷出版的新书，心情激动，感慨油然而生，这部著作必将像焰火一样，为憎恶黑暗的人们指引光明方向。

果然，《西行漫记》1938年2月面世，到11月已四次重印，售出二万余册。武汉、南京、重庆等地相继出现翻印本，人们读后，不仅了解了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、八路军的抗战决心和力量，也知晓了共产党的英明主张、解放区的大好局面。许多有志青年、进步人士从延安、解放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，他们冒险跋涉，奔向延安，寻求革命真理，实现救国抱负。



图为1938年、1948年出版的《西行漫记》。